



中国近代不平等条约书系

主编 李文海 匡继先



春帆楼的迷梦

· 马关条约 ·

周源著



中国近代早期启蒙的书籍

· 梁文海 · 王健著

海帆楼的迷梦

· 马建忠著 ·

商务印书馆

中国近代不平等条约书系

主编 李文海 匡继先

春帆楼的迷梦

· 马关条约 ·

周 源 著

(京) 新登字 156 号

中国近代不平等条约书系

主编 李文海 匡继先

春帆楼的迷梦

· 马关条约 ·

周 源 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发行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海淀路 39 号 邮码 100872)

印刷者：中国人民大学印刷厂

经销者：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787×960 毫米 32 开

字 数：84 000

印 张：4.75 插页 2

版 次：1993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199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册 数：1—2 000

书 号：ISBN7-300-01607-3/K·164

定 价：4.75 元

0005335

序 言

● 李文海

2199/04

迄今为止，辑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我国与世界各国订立的各种条约、协定之类最为详备的，还得推王铁崖先生所编的三大册《中外旧约章汇编》。列入该书目录的，共计 1182 件，其中除最初 7 件订于 17、18 世纪外，其余均为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所订立。这些约章的情形自然有很大的差别，有的内容涉及国家的许多重要主权，有的则只是某个具体问题的细节规定；有的属两国政府之间正式签订的，有的则只是同某些外国企业、公司等订立的章程、合同、凭照。但不管怎样，综观这些历史资料，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在当时国际社会中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和处境，却是一目了然的。

对于中国近代历史上这些约章的性质，自然免不了也有人把它说成是“揭开了（西方）对华事务的新纪元”，标志着中国与欧洲“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法律、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开端”一类的

话，^①但毕竟只是极少数的例外，一般来说，包括持有各种不同政治态度的人们，大都肯定这些条约是不平等的，“因为这些条约不是以平等国家之间的谈判为基础的，所以说它们是不平等条约”^②。

帝国主义强迫中国订立的不平等条约，曾经给予我国近代历史以何种影响，我们打算先引用一位业已作古的中国人和一位现在仍然健在的美国人的话，来为我们进一步思考提供一点参考的素材：

漆树芬在1926年出版的《经济侵略下之中国》（一名《帝国主义铁蹄下之中国》）一书中曾这样写：“比年以来，帝国主义与军阀之狼狈为奸，加重我内乱，掠夺我金钱，屠戮我民命，已成不可掩之事实。而为彼等最便于勾结，最利于进攻之工具，犹当数一部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根据不平等条约以达其压迫榨取之目的，军阀则靠此不平等条约以酿成此循环式之内乱，所以这一部不平等条约，实为我之酸心疾致命伤。”“由是观之，弱我中国者，资本帝国主义也；致我于危亡者，由此产生之不平等条约也。资本帝国主义

① 参阅菲利浦·约瑟夫著，胡滨译：《列强对华外交》，第3页。

② 这类议论可以说俯拾皆是。这里引用的是伯斯：《远东——东亚近代及现代国际关系史》中的话。

实为蚕食我之封豕长蛇；不平等条约实为束缚我之桎梏陷阱。”

准备引用的另一段话出自一位至今仍活跃在政治舞台的美国政要前些年出版的一本书，其中写道：“19世纪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条约、协定和治外法权条款，使人们清清楚楚地看到：不仅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地位低下，而且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同样地位低下。这一衰败的现实同中国人的自我意识发生猛烈的冲突。中国人认为在过去，甚至就在不久以前，他们在文化上和政治上还都比那伙蛮横的侵略者们富有和强大得多。事实上，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上发生大滑坡只是近代的事。”“这些事实驳斥了西方流行的看法：中国是一个停滞和颓废的帝国，而更加生机勃勃和更富进取精神的欧洲人可以随时欺侮它。”

读者也许会问：为什么你特地要引用这么两位人物所说的这么两段话呢？

确实，这中间并非没有需要说一说的小小的原因。

前几年，有位先生在一本颇有点名气的刊物上发表文章，批评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对异族侵略者的口诛笔伐的感情渲泄上，这就大大淡化了我们研究的理性色彩。”另一位先生则认为，解放以来关于西方殖民主义侵略造成了东方普遍落后的谴责，是一种早就应该抛弃的传统观念，这种观念“使历

史批判的天平倾斜了”。按他看来，殖民主义对东方历史“起了一种革命的作用”，“成为东方民族赶上现代文明的唯一的现实良机。”对于如此高深的理论，浅薄如我辈者自然难以领会，那末，我们先听听第三者的议论如何？前面引用的两段话，虽然也颇有点对殖民主义“口诛笔伐”的味道，但就作者而言，前一位早已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即已谢世，而且那本著作前面还颇有几位国民党元老为之作序；后一位本身就隶籍“西方”，那本书又是以预言共产主义的“大失败”为其主旨的，无论如何，停留在“感情渲泄”而淡化了“理性色彩”、甚至导致批判的“天平倾斜”之类的训斥，是决然不会加到他们身上去的。

“感情”和“理性”的关系，本是史学理论中的一个老问题。历史研究应该客观，所谓客观，就是要尽量探求历史的真实，实事求是地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去描述历史。是不是一定要心如死灰、不带任何一点感情色彩，才能对历史进行客观的研究和理性的思考，倒怕也未必。因为不带任何感情这一点首先就难以做到。观察任何问题，也包括观察历史现象，总要有一个立足点和出发点，或者叫立场。不同的立场就会有不同的感情，谁也回避不了。譬如说吧，不满于甚至谴责“异族侵略者”的侵略行径，这自然是一种“感情”；但对殖民主义感恩戴德，认为它对被侵略国家的征服，不过是给这些国家带来了文明和进步的普遍

福音，又何尝不是一种“感情”？这两种不同的“感情渲泄”，究竟哪一种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这实在不是靠自我的标榜，而要经受历史实际的检验。

话扯得稍为远了点，现在再拉回来谈近代史上的不平等条约。

帝国主义通过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的财富进行了大规模的疯狂的掠夺。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勒索的赔款即达2.3亿两白银，赔款总数加上分期付款的利息，相当于清政府三年财政收入，日本国家四年半的财政收入。俄、英、美、日、德等11国通过《辛丑条约》，则勒索赔款4.5亿两白银。张之洞所办的汉阳铁厂，是洋务企业中创办经费最多的一个，建厂时共支出银580余万两；也就是说，列强通过《辛丑条约》勒索的赔款，可以建设大约80个汉阳铁厂，较洋务派创办全部洋务企业时投入资金总和要多出好几倍。

这里还只是就不平等条约中对中国财富的掠夺一方面来说的。事实上，不平等条约是一条“屈辱的绳索”，从各个方面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捆绑得死死的，以便听凭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任意吸吮膏血，作践蹂躏。李育民同志在自己的论文中把不平等条约按内容归纳为如下六大类别：

(一)以租界制度和治外法权为主要内容的列强在华侨民管理制度；

(二)以协定关税、协定内地通过税、内河航行通商制度、陆路边境免减税制度、苦力贸易、自由设厂制度、路矿借款担保制度等为主要内容的列强在华经济特权制度；

(三)以海关行政外籍税务司制度和海关兼常关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列强在华行政特权制度；

(四)以自由传教和控制中国文化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列强在华文化特权制度；

(五)以对中国实行军事控制为主要内容的列强在华驻军制度；

(六)以在中国某一区域取得独占权益和领土主权为主要内容的列强在华划分势力范围和租借地的制度。^①

不言而喻，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会心甘情愿地将这些理应拥有的主权拱手送给别人，任何一个侵略者也都不可能仅仅通过“友好交往”就把这些特权轻易攫取到手。事实上，在每一个较为重要的不平等条约订立之前，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都曾动用兵舰大炮，通过血与火的残暴手段，用野蛮的军事侵略（当然必不可少的还要伴随着政治讹诈、经济施压之类的种种名堂）来达到他们的目的。正像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任英国侵华军全权专使的额尔金在谈到“天津条约”时十分形象

^① 见李育民同志于1990年8月提供给“近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近代中国的“条约制度”论略》。

地说的那样，这些条约是“用手枪抵在咽喉上逼勒而成的。”因此，在每一个不平等条约的背后，几乎都蕴含着一个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是血泪斑斑的悲惨故事。

如果我们说，了解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不平等条约，也就在很大程度上了解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特征，我想是不能算过份夸张的。

帝国主义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像蚊子吮血似的将坚船利炮的“尖刺”刺入近代中国的孱弱肌体，造成近代中国的“大出血”。这“血”流到了谁的身上，“失血”的中国人很清楚，吮血而肥者自然更明白。正是这损失惨重的“历史大出血”，才使得新中国的起步乃至今天的四化建设显得格格外艰难。而某些依靠在一个多世纪中大量掠夺世界各国财富而发家的强国的统治者，却在那里一本正经地指责或嘲笑中国经济“落后”的种种罪过，这难道是公平的吗？

历史无法割断。历史也就不应该忘却。

这也就是我们编辑这一套“中国近代不平等条约书系”的出发点。这一套书，打算选取在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最大的若干不平等条约，以一个或几个内容相近的条约写一本书，生动而形象地将条约签订前后的有关历史情况介绍给读者，一共准备出10册。每一册书既完整地反映一个独立的历史事件，全部出齐后又可对近代不平等条约的状况有一个总体的了解。

编辑这一套书的计划，最初是晓虎、仰东、孟超几位年轻人提出来的。他们希望我和继先同志也参予此事，并担负主编的责任。我略加思索，也就欣然从命了。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同这几位青年分别有过愉快合作的经验，相互之间都比较了解；而更重要的，是觉得这确是一件值得花些力气的颇有意义的工作，作为一个历史工作者，理应把这看做是自己份内的事。其意义，我想江泽民同志在《浩然正气》的《代前言》中的一段话说得极为深刻：

“现在，有不少的年轻人，对于我们国家和民族过去饱经忧患的历史，争取独立和解放的历史，不了解，不熟悉，甚至有些年纪大的人也渐渐淡忘了。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任务，必须向人们，特别是青年人，加强国情教育，加强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

我们希望这一套书能在这方面也起一点小小的作用。

1992年2月10日 于人民大学林园

目 录

	引子	(1)
1	骗局 陷阱	(2)
2	不宣而战	(20)
3	大溃败	(31)
4	海上悲歌	(51)
5	不伦不类的和谈闹剧	(71)
6	广岛拒使	(85)
7	春帆楼纪事	(96)
8	反割台斗争风暴	(111)
9	饱狗、饿狗的争斗	(120)
10	幕落剧未终	(127)
附录 1	主要参考书	(133)
附录 2	《马关新约》	(134)
附录 3	《辽南条约》	(140)

引子

春帆楼，位于日本国马关（今下关）红石山下安德天皇祠旁，本是一个不起眼、不见诸经传的小楼，但突然在一夜之间名噪天下，载入史书，引得史家凭吊，游人不绝……

春帆楼一夜成名，盖因 1895 年三、四月间，鼎鼎大名的李鸿章和他的儿子李经方作为中国政府全权代表，同样声名赫赫的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作为日本国政府全权代表，在这座小楼上进行了 6 轮谈判，以结束正在中国境内进行的中日战争。4 月 17 日，还是在这座楼上，双方签订了影响中日两国命运至深且远的《中日讲和条约》，也就是人们非常熟悉的《马关条约》。还有人取其签订处所之名，称之为《春帆楼条约》，但没有传开，只能在历史辞典中查到。

欲了解春帆楼内的唇枪舌剑，春帆楼外的炮火硝烟，还要从头讲起——

1 骗局 陷阱

1894年6月1日。朝鲜首都汉城。一名身材矮小的日本人来到清政府驻朝总理交涉通商大臣袁世凯的公署门前，请门卫通报，日本驻朝鲜公使馆书记生郑永伟有事拜见袁大人。

同是外交圈中人，时有来往，彼此并不陌生，袁世凯命令手下将来客引入署内。

主客分别落座后，彼此寒暄了一番，郑永伟有意把话题引到了朝鲜国内的局势上。

郑永伟故作焦急状，说：“朝鲜东学道匪乱已久，于各国商务大有损害，令人堪忧。揆度形势，朝鲜政府已无力平乱，而匪乱愈拖愈难办，贵国政府何不速速出兵代朝鲜政府勘乱？”

袁世凯对郑永伟毫无提防，随口答道：“朝鲜政府也曾向我国政府提出了借兵勘乱的请求。我国政府本希望朝鲜政府能通过平乱习战自强，故暂未批准他们的要求。但一旦接到朝鲜政府借兵的正式公文，我们即筹备出兵。”

紧接着，袁世凯又询问道：“乙酉年（1885

年)贵我两国签订的《天津条约》曾有约在先,如朝鲜有事,两国出兵时,需事前通知对方。如我国此次出兵入朝,应经由哪个途径知照贵国政府?”

郑永伟答曰:“由贵国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或北洋大臣通知即可。”接着,他信誓旦旦地保证:“我国政府惟盼贵国早日出兵勘乱,必无他意。”

郑永伟此次来访,是大有来头的。5月29日,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密电驻朝代理公使杉村浚,令其密切注意朝鲜政府与中国使节之间的关系,是否已向中国求援。6月1日,杉村浚通过朝鲜政府中的亲日派官员了解到,在当日的廷臣会议上,朝王与大臣已决定向中国借兵,但还不清楚中国政府的态度。于是,他速派郑永伟访袁,进行摸底,并力促中国出兵。

袁世凯不知来者用心,言谈之间,证实了朝王已派人向中国请兵,并透露了清政府准备派兵的内情。郑永伟听到这个消息,如获至宝,但他未敢把得意之色挂在脸上,又故作沉静地与袁世凯闲扯了几句,便起身告辞。

出了公署大门,郑永伟急忙驱车匆匆赶回使馆。车到使馆门口尚未停稳,他已跳下车来,三步并作两步,跑进院内,向守候多时的杉村浚做了汇报。杉村浚听罢,喜上眉梢,拍着郑永伟的肩膀连声称好,并转过身去,命令电报员火速向国内通报。

为了进一步了解朝鲜请援的情况和中国政府的打算，敦促清政府尽快出兵，次日，杉村浚亲自出马登门访袁。袁世凯仍毫无戒备，将实情和盘托出。

杉村浚开门见山问道：“盼华速代勘，允否？”

袁世凯答曰：“眼下还未收到朝鲜政府的正式公文，不便遽行出兵。如果朝方正式行文邀请，中国政府自可允准。”

杉村浚催促并建议道：“如果朝鲜政府的邀请公文发迟，东学道匪已占据全州，则汉城岌岌可危。我意应立即出兵进行防护，以防不测。但不知贵国政府究竟有何打算？”

袁世凯本人是力主出兵的，但因朝鲜政府尚未正式提出邀请，清政府亦未就此做出决断，只好回答：“或者出兵平乱，或者将商民转移到仁川，要待东学道匪逼近汉城时再做决定。”

杉村浚反复强调：“朝鲜政府如果正式行文向贵国借兵，请务必马上通知我们，以慰盼念。”

在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袁世凯出身于大地主、大官僚世家，纨绔子弟，不学无术，但仗着袁氏家族与执掌清政府军政、外交大权的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及其集团的密切联系，跻身仕途，春风得意，26岁（1885年）时，就被清政府派往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务。出使朝鲜期间，袁世凯对世界大势、国际关系和帝国主义列强激烈争夺东亚的态势，一无所知，惟知顽固坚持中